

苏 萍 / 著

谣言与近代教案

YUANDONG WENKU · BAINIAN ZHONGGUO

YAOYAN YU JINDAI JIAOAN

 远东文库 · *百年* 中国

SHANGHAI YUANDONG CHUBANSHE

上海远东出版社

谣言与近代教案

苏 萍 / 著

YUANDONG WENKU · BAINIAN ZHONGGUO
YAOYAN YU JINDAI JIAOAN

上海遠東出版社

谣言与近代教案

远东文库·百年中国

著 者/ 苏 萍

特约编辑/ 张建一

责任编辑/ 徐维东

装帧设计/ 范桥青

版式设计/ 李如婉

责任制作/ 晏恒全

责任校对/ 吴明泉

出 版/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336) 中国上海市仙霞路357号

<http://www.ydbook.com>

发 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上海远东出版社

排 版/ 南京展望照排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 上海长阳印刷厂

装 订/ 上海长阳印刷厂

版 次/ 2001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01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248千字

印 张/ 10.25

插 页/ 2

印 数/ 1-3100

ISBN 7-80661-443-5

C·4 定价: 22.50元

目 录

导 言	1
问题的缘起	1
概念的诠释	4
研究成果回顾	6
第一章 谣言：反教的手段	15
谣言的社会功能	15
产生谣言原因的解析	24
反教谣言的量化研究	28
第二章 反教谣言的制造者与传播者	45
渊源——明末士大夫的反教言论	48
士绅——反教谣言的制造者	60
官员——反教谣言的传播者	89
匪徒与游民——反教谣言的利用者	107
民众——反教谣言的信奉者	121
近代社会的畸形产物——教民	142
第三章 个案研究	163
剪辫与教案	163

	光绪十七年(1891)长江教案	182
第四章	反教谣言两大主题的社会背景	217
	采生折割	217
	诱奸妇女	234
第五章	反教谣言揭示下的深层中国	249
	男权的失落与亡种的忧虑	250
	性的行文——颓废社会的象征	273
结 语		293
主要参考书目		305
后 记		319

问题的缘起

教案并不是随着不平等条约同时出现的,当基督教以景教之名传入中国之后,就有了历史上第一例教案,即会昌法难。

会昌五年(845年),武宗灭佛,祸及景教:“其大秦、穆护等祠,释教既已厘革,邪法不可独存,其人并勒还俗,递还本贯,充税户;如外国人,送还本处收管。”^{〔1〕}景教经此一击,此后便一蹶不振。从贞观九年到会昌五年这二百余年,虽可称景教的全盛,但也非一帆风顺。从景教碑看,这期间至少出现过三次危机:其一为武则天圣历年间(698—700年),佛教徒在洛阳攻讦景教;其二为先天年间(712年),长安的士大夫攻讦景教;第三次,也是最为严重的一次是建中年间(780—783)士大夫对景教发动猛烈攻击,幸得德宗干预,才使景教免遭厄运。

明万历年间,据意大利耶稣会士曾德昭神父统计,明朝“传教士等所经危难之多,出人想象之外。我曾调查南京仇教以前教案

〔1〕《旧唐书·武宗本纪》,转引自孙江:《十字架与龙》,4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之数,共有五十四案”^{〔1〕},这些教案都属于地方案件,均由捕风捉影的流言而起。

清初康熙年间,钦天监革员杨光先首先对传教士发动攻击;其后雍正禁教,传教乃属违法。乾隆时,教案有三,其中最严重的一次,便是1784—1785年对传教士、教民的全国性大搜捕。嘉庆朝,教案有四,1805年和1811年是全国性大教案。道光二十二年,基督教获弛禁,自此到清朝被推翻,全国各地(除新疆未见记载教案之事外)均有教案发生。整个晚清,教案一直成为中国对外交涉重点之一,不平等条约是导致近代教案发生的直接原因,对此,学界多有研究,不用赘述。

本文从反教方法入手对教案做另一视角的研究。

纵观历史上所发生的教案,大部分是由士大夫通过各种形式的言论作为反教主要手段。明末反教言论汇诸于《破邪集》一书;清初杨光先对教士的攻击汇诸于《不得已》一书。至于晚清士大夫的反教言论则更是不计其数,他们充分利用奏章、函札、咨文、条陈、告示、禀稿、公呈、公禀、檄文、揭帖、告白、条规等各种形式进行广泛的宣传、或攻击、或拒斥、或鄙薄、或煽动、或造谣,重大教案的发生无不与揭帖有关,尤以制造谣言为屡试不爽的反教手段。令人惊讶的是,晚清士大夫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与明末迥然不同,而依恃不平等条约进入中国的传教士,与小心翼翼、谦卑地身穿儒服、手捧四书五经的利玛窦,除了在使“中华归主”这一点有相似之处外,在行为和态度方面与其前辈已大不相同。但是中国士大夫们反教言论的内容却一成不变,尽管在每一个时期,各有不同的重点,然而,无论哪个时期,论点都一再重复。事实上,都是同一批人在发言。如果将明末的《破邪集》与晚清士大夫的辟邪言论相比较,会令人感觉时间的流逝在士大夫们的身上没有任何意义。

〔1〕〔意〕曾德昭:《大中国志》,27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台湾学者吕实强将晚清士大夫的反教言论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拒斥教士入境与使其不能居留”；第二类是“禁止国人信奉”；第三类是“彻底驱除清除”。士大夫屡屡宣称对付基督教要“以舌锋攻之，笔尖杀之”^{〔1〕}，同时“设法激励乡绅，设法激励众民。贤者示以皇恩，愚者动以财货。焚其教堂、掳其洋货、杀其洋商、沉其货船”^{〔2〕}；对教民则将其下“油锅、捞其筋骨、剥其四肢、抽筋碎脑”^{〔3〕}。在士大夫的激励下，晚清教案持续四十载，遍及全国。参加人数，少则数十人、数百人，多则几千人，甚至几万人。“生命财产的损失，精神意志的挫耗，更不可以数计。率至不仅未能达成其预期的目标，反而教士、教堂与教民愈来愈多，且因反教而引发的内乱，招致的外患，使国家危及益趋深重。知识分子筹议策划的不当，自为主要因素”^{〔4〕}。

吕实强所指的“筹议策划”应该是指反教方法使用不当，即寄托于一系列具有煽动性的谣言，引发众怒，以迫使传教士放弃传教。就手段与目的关系而言，选择制造谣言作为反教策略手段，应该说是成功之举。国家积弱不振，无力与强大的对手在战场上通过武力较量，采用“舌锋”与“笔尖”作为抗争工具不失为智取。正如士大夫所宣称的那样，“笔尖”、“舌锋”确实杀死了不少的传教士与洋人。几乎重大教案的发生，谣言作为最古老的大众传播媒介，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挖眼剖心”、“迷拐幼孩”、“诱奸妇女”永远是“激励民众”最好的引爆器。1868年的扬州教案、1870年的天津教案、1891年的芜湖教案、丹阳教案、无锡教案、武穴教案、宜昌教案和1895年的成都教案等，都是因谣言所致。

社会心理学研究中所指的谣言不完全是贬词，它具有某种“策

〔1〕 吕实强：《晚清中国知识分子反教言论的分析之一——反教方法的倡议（1860—1898）》，转引自《“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台北）第4期，上册。

〔2〕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六十四，4—5页；台湾文海出版有限公司。

〔3〕、〔4〕 同〔2〕，4—5页。

略手段”的含义。本文就是在这个意义上研究反教谣言。

本文所关注的问题有三：第一，为什么不同的社会力量，上至官绅，下至秘密社会、盗匪与游民，都不约而同地选择谣言作为反教策略？第二，什么样的谣言才能引发教案？换句话说，为什么只有某些特定的谣言具备诱发教案的潜质？第三，在反教谣言的背后，隐藏着何种心理危机与社会危机？

士大夫们由于受条约限制，从法理上说，他们必须保护传教士自由传教权、教民自由信教权，这是他们极不情愿的，唯一的应对手段就是“以民制夷”。如果单纯地打出维护道统、崇正辟邪的旗帜，恐怕没有多少百姓会响应。因此他们选择利用特定的谣言来煽动百姓的反教情绪。作为心理现象的谣言，不仅具有时代性，更蕴涵着文化编码。借用奥地利心理学家荣格创造的术语，谣言是集体无意识的反应。不同的文化模塑出不同的社会心态，不同的社会心态亦造就出不同的谣言。没有特定的社会心态环境，特定的谣言不但很难生存，即便出现也不易得到广泛的流播，遑论使人相信，因为谣言的流传取决于是否能与制造谣言的人产生心理共鸣。本书利用心理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对作为“策略手段”的反教谣言进行解剖。

概念的诠释

本文使用的谣言概念属于一种政治武器，与常识性的谣言略有不同，日常生活所谓的谣言更接近于流言、讹言。为更有助于理解作为“策略手段”的反教谣言，有必要对几个相关概念作明确的界定。

“流言”一词始见于《尚书·金縢》，其文曰：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孺子。蔡沈注曰：“流言，无根之言，如水之流自彼而至此也。”谣言在我国史书上有“谣诼”之称，

始见于屈原的《离骚》：“众女嫉余之娥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注云：“谣谓毁也，诼犹谮也。”〔1〕

讹言更多是由于信息发送者的个人因素，如对事物的观察有偏差，记忆有出入而造成了对信息的歪曲，这种无意的歪曲在分散的社会大众中则表现为以讹传讹。

谎言这个词通常带有一种强烈的道德上的谴责意味，诚如《现代汉语词典》中所说，谎言是有意说不真实的话。

谣言、流言、讹言、谎言都属于“假言”，缺乏现实存在的真实性，只是“假言”的程度不一样。

谣言是彻头彻尾的假言，凭空捏造，毫无依据，即谣言的构成因素中没有一点真实性的条件。而流言的构成因素中有那么一点真实的东西，它往往并不直接出现在流言语言的主体构成之中，是作为一种外在的、与流言主体语言有瓜葛的“真”因素而存在。流言，事出有因；谣言，有意捏造；谎言则是一个人在他人并非心甘情愿的情况下，以隐瞒真实目的的方式给他人以虚假式错位的信息，意在使他人受骗。谎言和谣言颇为相似，都是不符合客观事物真相的假言，而且都是语言行为，都有心理因素深藏其间；而且谎言的心理表现及其内容更为鲜明突出。但谎言的流动形式与谣言是明显不同的，也就是说，同是语言行为，但行为方式不同。谎言，是一种被动的语言行为，是在“问”的状态中的“答”，不问而言的谎言者，几乎是没的。谣言，是一种主动的语言行为，在无问的状态中，主动讲给别人听的。从心理的欲动上讲，谎言者本无言语的心理动机和需求，他没有要讲话的心力交瘁冲动，而谣言者和流言者有一种强烈的要讲出来的心理冲动。谎言的流传性也没有谣言的流传性强，在心理目的上，两者也不同。谎言的目的是为了掩盖真相，谣言的目的是为了制造一个“真相”。至于讹言在四者中其主体行为

〔1〕 转引自周晓虹：《现代社会心理学》，42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最为淡薄,它是由于记忆容易遗漏、容易理性化和失真所致。

流言、讹言、谣言的传播,一般说来是单线、匿名的,很难寻访到它们的最初来源,但是这三者最大的区别在于谣言的制造者是有目的、有意图的。流言和讹言一般无法判定制造者,它们的目的也不明确,更多地体现为好奇心理。谣言是一旨在使人相信的宣言,它与当前时事有关,在未经官方证实的情况下广泛流传。

在教案史料中,谣言、讹言、流言常常混用。我认为使用“谣言”更能准确无误地解释当时的真相,因为“谣言”被社会不同力量选择作为打教、闹教、反教的主要手段。它有一系列的制造者,部分是匿名的,部分是具名的,而具名的谣言作者以士绅居多,士绅在中国社会的权威身份为荒诞不经的谣言披上了一层真实的外衣。鉴于此点,本文选用“谣言”这一概念。

史学界对近代教案的上限,意见比较一致:以1848年的上海青浦教案作为起点,在下限的问题上则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教案的下限应为1900年义和团运动失败,义和团运动是教案的总汇合和高潮,是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的教案的继续和发展。另一种意见认为,教案史应以1898年的山东犁园屯起义为下限。本文的重点是教案中的谣言研究,而非教案史,因此与教案有关的谣言均为研究对象。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的《教务教案档》始自咸丰十年(1860),终之于宣统三年(191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出版的《清末教案》始自道光二十二年(1842),同样终之于宣统三年。本文研究的时间范围主要依据上述两份史料。

研究成果回顾

(一) 1949年以前的研究状况

20世纪20年代,由于非基督教的蓬勃发展,出现了一大批论

及基督教的文章。这些论著着眼于批判基督教会对帝国主义势力的倚赖,其主要目的在于宣传,激励青年投入非基督教运动,而不在于对基督教进行客观的学术研究。有关这方面的文章有陈独秀的《基督教与基督教会》,抨击基督教会是帝国主义殖民政策的“导引”,是资本主义压迫远东民族的帮凶。1924年12月《中国青年》编辑部和上海非基大同盟合编出版《反基督教运动》一书,发表了当时影响较大的杨贤江的《反基督教运动》、李春藩的《传教士与帝国主义》、蔡和森的《近代的基督教》、朱执信的《耶稣是什么东西》、梅电龙《基督教与中国》五篇文章。这类批判性的文章还有恽代英的《打倒教会改革》,发表在《中国青年》第六期;公宪的《从〈新约〉里观察基督教》,发表在《觉悟》1924年10月;贺成圣的《反对教会化的中国学校》,发表在《觉悟》1924年10月14日;秋莼《传教西人俎武下的青年》,发表在《觉悟》1925年3月11日。至于教案研究却甚为薄弱,据查考,至20世纪30年代初才有关于教案的文章出现,仅发表有关文章十一篇,其中六篇尚属资料的披露与介绍,另五篇也为教案解释和个案记述之类。1940年福建协和大学的王治心教授出版了《中国基督教史纲》,是学术界研究基督教的开山之作。此书叙述了基督教自唐代至20世纪30年代在华传播的历史。由于作者是教会人士,对基督教在中国社会的影响不免有夸大之处,而且忽略或回避了政治上的分析。1947年协和大学又出版了王文杰的《中国近世上的教案》,作者主要从中西文化之不同来探讨教案发生的原因。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后,对基督教的议论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都趋于低沉。

(二) 1949年以后的研究状况

新中国成立后的教案研究以1978年为界,区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成果较少,讨论的问题不多;后一阶段成果渐多,逐步形

成研究热潮。论著包括：李时岳《近代中国反洋教运动》（1958年）、《反洋教运动》（1962年9月）。对于教案的起因，作者认为主要是传教士挑拨教徒与非教徒之间的关系，破坏中国人民的团结。对于反洋教的性质，作者认为：“反洋教运动是近代中国历史上巨大的、广泛的、持续的反帝爱国运动。”李著对教案冲突的分析，基本上是以教划线，同时对教案背景分析也未能充分注意到文化、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因素，仅在政治层面找原因，尽管如此，在当时的条件下此书仍然可以说是比较客观的少数著作之一。南史著《天津教案》（1967）；天津历史研究所天津史话编写组编《火烧望海楼——1870年天津人民反洋教斗争》（1973）；周键钟编著《贵州三“教案”》；顾长声著《传教士与近代中国》（1980）；顾卫民著《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1996）；张力著《四川义和团运动》（1982）；庚裕良著《广西人民反洋教斗争》（1987）；戚其章、王如绘编著《晚清教案纪事》。

1949年以后出版关于教案的资料集六种，包括：南昌人委办公厅历史沿革组编《一九零六年南昌教案资料专辑》；王明伦选编《反洋教书文揭帖选》；四川省档案馆编《四川教案与义和拳档案》；庚裕良、陈仁华、吴国强编《天主教基督教在广西资料汇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与福建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合编《清末教案》三辑（计划出五辑）；廉立之、王守中编《山东教案史料》。

关于教案研究的论文及资料介绍的文章，全国各学术刊物及各大报先后发表 303 篇（不包括关于对教会与传教士评价的文章）。就研究的内容来说，属于总论的有 80 篇，这类文章多重于理论分析和总体研究；属于区域教案研究的有 65 篇，研究范围已涉及 18 个省区，其中以教案多发地区的长江中下游各省和山东、西藏等省区研究为多；属于个案研究的有 158 篇，大多集中于天津教案、两次大足教案、景廷宾起义、贵阳教案、两次南昌教案、两次重庆教案、宁海教案、贺金声起义、周汉反洋教案、梨园屯教案、金丹教起义、

青海教案、酉阳教案、湘潭衡州教案、霍山教案、巨野教案等。

史学工作者在教案研究过程中提出的主要问题,大致有四个方面。其中,在客观的理论分析方面主要集中在对教案的起因、性质和评价方面,在这个问题上基本有三种观点。

1. 反侵略 这种观点认为基督教传入中国是以不平等条约为前提的,是帝国主义侵华政策的一部分,因而反洋教斗争是近代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民族自卫性质的爱国主义斗争。这是自建国初期就形成并被普遍接受的观点,至今仍为大多数人所坚持。这种观点可以概括为主要矛盾论,即反洋教斗争是近代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矛盾——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不断激化的产物。

2. 反封建 这种观点主张反封建不应只是对封建制度为标准,农民自发地反对封建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也是反封建,而封建的剥削和压迫不仅来自本国地主阶级,而且来自在华的外国传教士。

3. 中西文化冲突 包括如下一些看法:① 反洋教斗争是西方文化冲击了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引起的。首先,实践证明基督教教义、教规与中国传统儒家伦理文化的冲突;其次,还包括西方一神教与东方多神教的矛盾,西方习俗与中国风俗习惯的矛盾,新学与迷信的矛盾等。② 反洋教思潮是清朝封建顽固派官绅反对洋教教义以维护儒学道统的守旧思潮,它虽然带有激发人民起来反侵略的一面,但更重要的则是维护封建纲常名教,保护清王朝专制统治,同时把人民群众引导到盲目仇洋,笼统灭教的极端排外主义的邪路上去。③ 以往中国近代教会、教案史的研究,由于受到“帝国主义模式论”的影响,出现偏畸现象。上述的“主要矛盾论”是传统看法的延续,它以理论概念的注释来代替历史的分析,把复杂的历史现象看得过于简单了。如果只看到教案是民族矛盾激化的结果,那么,为什么在庚子以后教会大发展而教案锐减呢?难道

那时的民族矛盾淡化了吗？其实自基督教传入中国之后，就有教案发生。上文已说过，最早的教案始于唐朝会昌法难；明末有南京教案；清初康熙年间，传教士汤若望入狱；其后，雍正、乾隆、嘉庆三朝都有教案发生。数量虽然不多，但却是发生在中国历史上最强劲的唐朝及清康乾时期，何以当时的传教士人数尚少，个个小心翼翼，依然不免于教案发生，如果用民族矛盾激化则很难予以解释。

宗教既是社会现象又是心理现象，教案的研究必然要触及心理层面，离开了心理层面来看教案是不全面的，对教案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有待于更多的个案分析。在微观的实证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程啸在《甲午战后山东教案刍议》中，对特定区域的教案从教会势力的发展、民族矛盾的加剧、官方政策等进行了多方面的考察，论证了教案为什么会发展成为一场民族运动的大风暴。在考察涉及教案的社会各界的动态方面，蔡少卿先生对秘密社会，特别是哥老会在长江教案中的作用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指出了哥老会反教的动机与其他教案的区别。翁飞以《李鸿章经办教案是媚外还是排外？》为题，考证了李鸿章对教案的态度，纠正了以往的一些不实之词。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学者从心理的角度考察了教案的形成。如程啸的《民族意识与近代教案》探讨了在群众反教斗争中爱国激情、伦理信念、打教讹言与排外心态的综合作用。孙江的《十字架与龙》、董丛林的《龙与上帝》、李文海的《世纪之交的晚清社会》均涉及到谣言与教案的关系及中国文化凸显的心理话语，甚至提及变态的性心理^{〔1〕}。

（三）台湾的研究状况

20世纪60年代，台湾学术界开始研究教案，出版了一批很有价值的研究著作及论文。最值得一提的是，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

〔1〕 陶飞亚、刘冰冰：《近年国内基督教史（新教）研究简评》，转引自朱维铮主编：《基督教与近代中国文化》，27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史研究所吕实强的一系列论著,包括《中国官绅反教的原因》、《重庆教案》、《周汉反教案》、《晚清中国知识分子反教言论的分析之一——反教方法的倡议(1860—1898)》,无论是在史料的运用或是研究方法都令人耳目一新。陈银昆的《民教冲突的量化分析》填补了教案研究在计量分析方面的空缺,通过统计数据说明导致教案发生的各种因素,很有说服力,是一本非常有价值的专著。其他还有教内的宇宙光传播中心出版社于1993年出版了丛书“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历史博物馆历史文化系列”。

台湾对教案研究的主要特点是研究方法新颖,尤其重视对个案的分析,与大陆学术界相比,更具客观性,学术价值也更高一些。

(四) 欧美的研究状况

欧洲研究教案多集中于法国(因为教案多与法国天主教有关),专著有谢和耐的《中国和基督教》、沙百里的《中国基督徒史》。

美国史学界对基督教在华问题研究始终持续不衰,出版了一大批的论文集和专著。主要有:巴尼特和费正清合编的《基督教在中国:来华新教传教士早期著述》(*Christianity In China: Early Protestant Missionary Writings*, 1985)、保罗·科恩的《中国的反基督教传统》(*The Anti-Christianity Tradition In China*, 1961)及《中国和基督教:传教运动与中国排外主义的兴起,1860—1870》(*China And Christianity: The Missionary Movement And The Growth Of The Chinese Anti-Foreignism*, 1860—1870)等。这些著作的内容几乎涉及传教士在华活动的各个方面,代表了该领域的最高研究水平。

关于对谣言现象的研究,国内只见到一本对谰谣的研究,是武汉大学历史系谢贵安的力作《中国谰谣文化》,谰谣与谣言既有相同之处,又有相异之处,两者都属于舆论宣传,而谰谣的宣传目的

更为明显,并且往往以预言的面目出现。学术界对谣言的研究并不多见,邓伟志主编了一套大众心理学丛书,其中有一本研究谣言的小册子《错位的心态》。

国外对谣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法国和美国。法国有个“谣言调查研究基金会”;美国有个“谣言研究所”,出版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台湾翻译的法国心理学家卡普费雷《谣言》一书,书后附录参考书目中以“谣言”做书名就达六十余种。